



本作品受“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

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

单韵鸣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

单韵鸣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单韵鸣著. —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454-6

I. ①广… II. ①单… III. ①粤语—语法—研究—广
州市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26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

单韵鸣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54-6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3/4

定价:28.00 元

序

语言变异研究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汉语变异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方面，语法方面很少有人涉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语法变异形式上难以把握，材料难以搜集，描写难以深入细致，更难以量化。另一方面，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向来深受传统结构主义的影响，研究以静态描写为主，多重视语言项目的语义、句法功能等内部特征，对语言项目的动态发展和影响语言项目使用的外部因素都缺乏足够的关注。单韵鸣的《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由其博士学位论文成书，作者不囿于传统研究的常规套路，结合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敢于尝试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广州话语法的变异，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角度，都是一个创新。这一研究为广州话，甚至汉语方言语法学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作者有扎实的语言学本体研究功底，广州话又是作者的“第一语言”或“母语”，这使得作者能够在系统把握广州话语法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挑选出方言特征明显的语法项目进行微观研究。作者

选取的语法项目类型多样,涵盖面广;同时,作者又注意以点带面,由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到宏观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广州话语法的整个发展趋势,寻找发展的规律性。这是社会语言学语法变异研究的一个较好的途径,对汉语及其他方言的变异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

该研究借鉴了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异理论等学科前沿成果,通过切实可行的抽样方式选取数百名广州本地人进行调查,并结合问卷、访谈、电台语料等,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认真的统计分析,得出大量的相关数据。书中分析深入,数据翔实,见解独到;关于广州话语法发展趋势的讨论逻辑严密,结论可信。全书布局合理,条理清晰,语言规范流畅。

书稿也有尚待改进的地方。例如,语言内部因素如何制约语法项目在语言竞争中最终获胜或落败,还有待深入挖掘;不同的语法项目变异的速度或程度不一致,如能从使用分布上找出不同项目变异的速度差异的表现,并能用数据或模型加以说明,那么整个语法系统变异的状况就有望能描写得更清晰、更有层次性。

总体来说,《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是一本很好的书稿,它扩展了语法研究的领域,对粤方言语法变异研究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希望能早日看到该书的出版。

郭 熙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研究内容	(6)
1.2.1 语法项目的选取	(6)
1.2.2 变项和变式的确定	(11)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6)
1.3.1 统计分析方法	(17)
1.3.2 调查问卷的设计	(19)
1.3.3 抽样	(21)
1.3.4 语料库的制作	(26)
第二章 变调项目的变异	(29)
第一节 形容词“大”“长”变调表小称的变异	(30)
2.1.1 变项和变式的确定	(30)
2.1.2 问卷调查结果	(32)

2.1.3 电台节目语料库的调查结果	(37)
2.1.4 两个项目调查结果的比较	(38)
第二节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变调后表程度加深的变异	(39)
2.2.1 变项和变式的确定	(39)
2.2.2 问卷调查结果	(42)
2.2.3 电台节目语料库的调查结果	(49)
2.2.4 为什么少用变式 1 和变式 2 ?	(50)
第三章 体貌表现形式的变异	(56)
第一节 通过动词的变调表示完成体的变异	(57)
3.1.1 完成体的两个变式	(57)
3.1.2 两个变式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	(59)
3.1.3 不同动词用于变式 1 时的常用度高低问题	(63)
第二节 短暂体“动词+下”的变异	(67)
3.2.1 短暂体的两个常见变式和调查结果	(67)
3.2.2 “VV”式与动词的关系	(71)
3.2.3 “VV”式逐渐渗透的表现	(74)
第四章 动词后置成分的变异	(76)
第一节 后置副词“先”和“添”的变异	(77)
4.1.1 “先”和“添”及其变式	(77)
4.1.2 关于“先”和“添”的调查结果	(80)
4.1.3 “先”和“添”调查结果的比较	(94)
第二节 后置成分“得滞”“乜滞”和“咁滞”的变异	(97)

4.2.1 “得滞”“乜滞”和“咁滞”的语义、句法特征及用法	(97)
4.2.2 “得滞”的相关变式和调查结果	(99)
4.2.3 “乜滞”的相关变式和调查结果	(109)
4.2.4 “咁滞”的相关变式和调查结果	(114)
4.2.5 三者的比较	(119)
第三节 后置连接成分“得嚟”的变异	(123)
4.3.1 什么是后置连接成分	(123)
4.3.2 “得嚟”的语义、句法特征及用法	(125)
4.3.3 “得嚟”变异状况的调查结果	(133)
第五章 某些特殊句式的变异	(144)
第一节 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	(144)
5.1.1 普通话和广州话的处置句	(144)
5.1.2 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几个变式和问卷调查结果	(146)
5.1.3 电台节目语料库的调查结果	(150)
5.1.4 模拟情景补充调查的结果	(153)
5.1.5 分析和讨论	(154)
第二节 带“好”字的责备类转述句的变异	(156)
5.2.1 “好”的适用句式	(157)
5.2.2 “好”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160)
5.2.3 带“好”字的责备类转述句的调查结果	(162)
5.2.4 回访和语料库语料对统计结果的补充	(165)
第六章 相关分析与讨论	(168)

第一节 项目变异总说	(168)
第二节 从变异看竞争	(177)
6.2.1 普通话向广州话渗透: 方言特色项目的蜕变或式微	(178)
6.2.2 广州话向普通话渗透: 方言特色项目占优并影响普通话	(178)
6.2.3 相互渗透下的两个次现象: 双方的对峙与劣势中的坚持	(179)
第三节 由变异预测发展	(180)
6.3.1 坚持还是靠拢?	(180)
6.3.2 语言的简化与多样化并存	(185)
6.3.3 使用者在语言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1)
第七章 结语	(192)
第一节 结论	(192)
第二节 有待完善之处	(195)
附录	(198)
附录 1	(198)
附录 2	(210)
图表索引	(211)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6)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引言

在描写语言学和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结合下,现代方言学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功。目前,社会语言学是汉语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游汝杰,2007)。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都以实际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而研究目的之一都是为了探索语言的演变,西方早已有学者把社会语言学纳入方言学的范围(Francis,W.N.,1983; Chambers,J.K.&Trugill,P.,1998)。汉语方言学应以同样的理由,引入社会语言学,革新研究理念,拓展研究焦点和研究方法,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语言变异,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陈松岑,2001:48),也指语言结构系统中某些内容的实现形式不唯一的现象(徐大明,2006:3)。广义的语言变异包括语言历时的变化,即通常所说的“语言变化”,狭义的语言变异则只针对使用语言项目时的共时差异,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语言差异。本文所论述的变异主要是指狭义的语言变异,即一时一地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使用差异;在论述进行中的变化时,也会延伸至广义的变异。根据语言变异的定义,语

法变异是指具体某个语法项目的变异。这个项目可以是某个语法范畴（如时、体、态、性）、语义—语法范畴（如程度范畴、否定）、词类（如形容词、副词、动词）、具有相同句法分布的词形成的组合或结构（如 such...、“副 + 名”“有 VP”）以及某项语法规则等（曾炜，2007）。由于语法系统相对稳定，语法项目变异的出现频率不如语音、词汇的变异那么高，收集起语料来也相对比较困难，因此比起语音、词汇的变异研究，国内外语法变异的研究都较为薄弱。

粤方言是中国七大方言中的强势方言之一，广州话（广府话）作为粤方言的标准语，在粤方言中的“老大”地位毋庸置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州话语法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对广州话进行系统描写的代表性专著有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1980）、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1995）、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2004）；针对某些语法项目或从某个视角进行描写的代表性专著有方小燕《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2003）、彭小川《广州方言助词研究》（2006）、杨敬宇《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2006）；代表性词典如饶秉才等《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麦耘等《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1997）、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1998）；相关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仅列举如下：黄家教等《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1983）、施其生《论广州方言的虚成分分类》（1995）、周小兵《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1997）、彭小川《广州话的动态助词“翻”》（1999）、方小燕《广州话的疑问语气词》（1996）、杨敬宇《三部粤讴作品中的可能式否定形式》（2005）等。香港粤语和广州话差别不大，香港学者对粤语语法的研究也有很多，如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1972、2007），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参数理论》（当中很多内容涉及粤语语法）（2003），梁仲森

《当代香港粤语语助词的研究》(2005), Peppina Po-Lun Lee (李宝伦) *Cantonese Particles and Affixal Quantification* (2012), Carine Yuk-man Yiu (姚玉敏) *Directional Verbs in Cantonese: A Ty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2013) 等。前贤大多从本体出发,对广州话语法系统或某一语言项目进行共时描写或比较,有的也探讨历时变化的情况。这些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不足之处是:更多地关注语言项目的有无和定性,却忽略了语言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使用者的各种社会因素对选择语言项目的影响,而这些正是社会方言学变异研究所侧重的方面。

广州话变异研究相对滞后,现有成果有的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广东地区的语言变迁大势(陆镜光,2003),有的论述广州话和普通话、香港粤语的语词接触机制(张振江,2007),有的研究广州某地区青少年粤语声母音变的情况(彭小川,2008)。至于语法变异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仅有李炜、郑定欧和伍巍等人在其文中谈及些许。李炜(1993)发现“将”字句常用度的高低可能与使用者的文化层次有正比关系,但未进行大规模调查验证。郑定欧(1998)指出香港粤语和广州粤语分别为粤语的变体,两种变体在语音、文字、语汇、语用及语法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语法方面,广州的粤语更接近普通话一些,具体体现在说粤语时套用普通话词语。郑的观察确有其独到之处,可惜所持的论据似乎仍属于词汇范畴,而非严格的语法范畴。对于广州粤语如何在语法或句法方面表现得更接近于普通话,文中并无详细论述。伍巍、陈卫强(2008)通过观察和问卷调查得出在“VP 唔 VP”类句式中,现代广州话主要使用“V 唔 V”式和“V 唔 VP”式;在“有 VP (NP) 冇”类句式中,现代广州话主要使用“有冇 VP”式;在

“VP 唔曾（未曾）”类句式，现代广州话主要使用“VP 未”式；而早期的一些句式，使用者都是老年市民。他们的调查主要是为了理清广州话反复问句的历时演变过程，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句式间的共时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年龄群体间使用的差异，但是，由年龄等社会因素所造成使用句式上的共时差异并不是文中论述的重点。总之，把握广州话整个语法系统，从中挑选语法项目，选择不同的社会群体，细致深入地进行变异研究的学者较难找到。

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学者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关注香港或澳门地区的粤语问题相对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占了广东方言研究中社会方言学成果的大部分。成果中有的从宏观出发，论述港澳地区特有的社会语言问题（潘彼得，1982；陆镜光等，1985；詹伯慧，1993；邹嘉彦，1997；程祥徽，1995；盛炎，1994），有的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出发，探讨香港粤语语音（潘彼得，1981；包睿舜，1983）或句法（余霭芹，1997；张双庆等，2005；石定栩等，2002、2003；邵敬敏等，2006）方面一些具体项目的变异。余霭芹（1997）结合历时和共时的考察，对40多名被访者进行调查，发现“比”字句和“过”字句在不同语域内常用度不同，“比”字句多用于书面语或新闻报道等语域，“过”字句多用于口语。她还发现“过”字句逐渐受到来自普通话的“比”字句的侵袭，“比”字句对“过”字句的渗透以词汇扩散的形式发展。张双庆、郭必之（2005）亦讨论“过”字句因受到“比”字句的渗透而引发的变异。他们以讨论语言内部因素为主，细致分析“过”字句和“比”字句分别适用于哪些不同的句法情景，从而造成两者在某些使用场景上的分立。石定栩、朱志瑜、王灿龙（2003）通过分析在《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和《明报》三份香港影

响较大的报纸中收集到的语料,指出在英语的长期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的句法结构出现了不少变异,包括直接借用的结构形式、仿照英语结构构造的短语以及句法功能变化了的词汇等。除了英语的影响之外,香港书面汉语的变异可以归纳为三类:粤语的移用、文言的沉淀以及与粤方言和文言都不甚相关的特殊变异(2002)。邵敬敏、石定栩(2006)把香港书面语句法变异的手段分为代用、借用、混用、中英文夹用、某些词语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使用汉语的省略格式等数种,并将变异后的香港书面语定义为“港式中文”,指出变异的原因主要源于共同语、方言与外语的相互接触和渗透。

广州话、香港粤语和澳门粤语同属于粤语这个母系统,不过三地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差异甚大,三地的语言各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三个粤语“子体”,所以港澳任何一地的粤语语法变异都不能代表或说明广州话语法变异的情况。当然,前贤所使用的方法及所做的积累均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比如说对一定规模的本地人进行调查,在一定数量的封闭材料中收集有价值的语料,分析变异的原因可结合语言外部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

当今,广东地区的信息业发展迅猛,推普工作不断深化,新客家人人口大量迁入,流动人口比例快速增长,广东与国内外的接触日益频繁。处于快速发展和多变的全球化时代,广州话作为广东粤方言的代表,广州话变异研究更凸显其研究价值。具体说来,研究意义有以下几个:(1)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探究语法项目在语言运用中的实际状况,有望得出语法本体研究所不能得到的发现;(2)方言的变异问题既可能涉及由语言接触、渗透、竞争、融合等因素诱发的变异,也可能有一些由于语言自身因素而引起的变异。变异情况错综复杂,研究所得将

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得到的变异机制,在方言语法变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意义;(3)从研究广州话变异现状到预测它的变化发展趋势,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过后再研究再预测,研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成果既能直接服务于粤方言地区的语言规划,又能为研究广州话的历时演变提供重要参考。

第二节 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选取广州话多个具有特色的语法项目,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进行调查,掌握它们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的分布现状,了解它们与其他项目的竞争状况,试图探究其变异的原因,最后预测广州话语法的变化发展趋势。

1.2.1 语法项目的选取

广州话语法系统内语法项目众多,要研究广州话语法项目的变异关键在于确定有限的待查语法项目。确定了待查的语法项目,也就确定了我们研究的对象。广州话的语法系统建立在汉语 SVO 语序的结构框架里,分主语、谓语两大部分,包括修饰语、中心语和补语等成分。广州话在形成的过程中,其语法体系在来自上古和中古的共同语的影响力量以外,又糅合进了来自本土的(也许有少数民族语言底层)方言因素的影响(杨敬宇,2006)。在共同语和本土方言的合力作用下,广州话语法既有与共同语相近之处,也有不少跟共同语存在较大差别、体现本土方言特色的地方。如需照顾全局,与普通话(共同语)存在

差异的语法项目和与普通话没有差异的语法项目在选取语法项目时都要考虑进去。广州话与普通话没有差异的语法项目大多集中在用于动词前的副词和介词^①方面。副词和介词的变异状况一般出现在同类词的内部聚合上以及与其他语法项目的组合上。广州话里表超量级的副词“超”（彭小川，2006）、“狂”“劲”的出现；介词“打”（从、自从）“运”（从、由）等的式微；以“好 Man”“电联”为代表，“副+名”组合的逐渐增多以及“状+名”结构中介词的消失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变异的状况与普通话副词和介词变异的状况大同小异，加上研究时间、条件和能力所限，对于广州话与普通话没有差异的语法项目，我们暂且不做研究，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普通话（共同语）存在差异的语法项目上。

广州话与普通话存在差异的语法项目也很多，我们主要参考了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1995）、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2004）、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②（1972、2007）三本具有代表性的粤方言研究专著，提炼出较能体现广州话方言特色的6个类型：

（一）词语通过重叠、变调（有时两者兼有）来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的现象较多，例如动词变调后改变词性，名词、形容词变调后指小称，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变调后表程度的改变，通过动词的变调表示完成体。

（二）与普通话不同的体貌表达方式：用动词变调的形式表示完

① 这里说与普通话没有差异指的是：广州话的副词和介词与普通话的副词和介词只有使用不同词汇上的差别而没有类别上的差别。

② 香港粤语和广州话同属粤语母体，其语法系统及主要语法项目在基本框架内差别甚微，而且此书是研究香港粤语的重要代表作，故把此书亦作为重要参考之一。

成体；“动词+下”的形式表示短暂体^①；还有一些体貌表达方式在普通话里没有固定的表达方式，如实现体“有V到”、近经历体“VP嚟”、回复体“V翻”和始续体“V开”。

（三）与普通话不同的语序，主要表现在谓词修饰成分的后置语序和部分宾补语序上。

（四）量词具有定指功能。

（五）更为发达的语气助词系统。

（六）某些特殊句式，如带复指受事成分“佢”的处置句、表示对动作行为已经发生的肯定判断的“有”字句、表示对事物、人物真相的判断的“……来嘅”（来的）句式；表示比较的“过”字句、带“好”字的责备类转述句。

在多年推普工作的作用下，不少学者认为广州话已有向共同语靠拢的趋势（李新魁等，1995；郑定欧，1998），其主要表现是方言特点被日益消磨，而且这种趋势不局限于词汇领域，语法领域也不能避免（黄家教等，1983；余霭芹，199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杨敬宇（2006）以广州话很多成分至今仍为“后置”这一特色现象为论据，力证虽然广州话受到普通话的不断影响，从共同语中借贷了一些语法内容，出现“共存共用”的语法现象，但是“前置”和“后置”两股力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交叉的发展，从共同语引进的一些表达方式只是起到丰富表达的作用，并没有动摇或改变广州话“后置”的语法基础。广州话一直与共同语保持基本的距离，二者的接触不会导

① 詹伯慧（2004）把“动词+下”归为“短暂体”，而李新魁等（1995）则称“轻量体貌”，张洪年（2007）未明确将其定义为“体”。为了便于分类分章论述，本书把“动词+下”归为“短暂体”。